

瞿佑《资治通鉴纲目集览镌误》考述

乔光辉

摘要：文章首次披露了瞿佑鲜为人知的《资治通鉴纲目集览镌误》一书的内容与价值。该书的重现，不仅可以进一步探究瞿佑的治学思想与学术视野，还可以窥见瞿佑狱中心态。该书的辗转收藏，也见证了江南私人藏书

关键词：瞿佑；集览镌误；狱中心态；江南藏书
中图分类号：K2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3-0005-06

《资治通鉴纲目集览镌误》（下简称《集览镌误》）是明初文人瞿佑所写的一部书稿。瞿佑75岁回顾一生著述时称：“……阅史则有《管见摘编》、《集览镌误》。”^①但近时学者均没有见到该书。如1988年，陈庆浩先生在《瞿佑和剪灯新话》称“书未见，序则收于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②；1997年徐朔方《瞿佑年谱》称瞿氏著作“今所存者，唯《乐全集》、《乐府遗音》、《归田诗话》及《剪灯新话》”^③；同年，李剑国、陈国军也详细地考述了瞿佑著作，然其所列见存瞿氏诸书中亦不见《集览镌误》^④。笔者在近年整理“瞿佑全集校注”的过程中，细细寻觅，终在上海图书馆发现该书。上图所藏瞿佑著《集览镌误》是鲜为人知的等级藏品。该书共220页，页11行22字，黑口四周双边，上下粗黑口双鱼尾，卷终有清常道人赵琦美亲笔题跋，署“永乐刊本”。笔者也检索到该书的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与上图藏本不同的是，内阁文库分为上下两册，页10行18字，上下双花黑鱼尾，内阁文库藏本前除了瞿佑自序外，尚有一个不完整的他序，

略曰：

永乐间，瞿长史宗吉、陈赞善伯载俱博学多才，相友善，推重一时。宗吉尝镌定王氏《纲目集览》之误，时在非所，偶得其书，读之有字句误者、事意误者、义理误者、有大关系或轻小者各标注其上，无他书参考，仅记忆耳目所闻见者，据事理而裁正焉耳。乖谬尚多，欲尽而未能，乃录之自随，得二百一十有六条，俟加详焉，始入梓补各卷之末，此宗吉志也。久之竟谪遣塞外，愈无书可毕此志，既而见伯载已梓行其《正误》，曰：“吾志成矣。吾老友所谓先得其所同然者矣，吾奚以为？”欲并其前所录者弃之，暹请为家曰：“……而况《集览》挟己见而妄为之附益，则何其谬误之多？”盖公在洪武、永乐间与赞善公并以博学善记忆闻，而公制作犹富，宜其镌正谬误有待也……（下缺）^⑤

由于序言不完整，我们无从得知该序的最终作者。但很明显，该书的出版与瞿佑的侄子瞿暹的怱怱密不可分。该序还流露出瞿作问世于陈济《集览正误》梓行（永乐壬寅，1422）之后；又，此序多次出现“永乐间”字样，考虑序言乃追忆旧事，永乐应为前朝；且据程敏政《乐府遗音序》称：“其于先生遗文若《兴观集》、若《咏物诗》、若《剪灯新话》、《集览镌误》俱已刊行。”^⑥可知瞿佑《集览镌误》当在《乐府遗音》刊行之前（天顺七年，1463）

- ① 瞿佑《重校剪灯新话后序》，见《古本小说丛刊》第33辑《剪灯新话》跋。
② 陈庆浩《瞿佑和剪灯新话》，台湾《汉学研究》第6卷，第1期（1988）。
③ 徐朔方《小说考信编》4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④ 李剑国、陈国军《瞿佑续考》，《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

收稿日期：2008-02-15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资助项目“瞿佑全集校注”阶段性成果（0525）。

作者简介：乔光辉（1971—），东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明清小说与戏曲。

⑤ 该序由南京大学金程宇教授摘自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特此致谢。

⑥ 程敏政《乐府遗音序》，见赵尊岳辑《明词汇刊》第12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问世；而“遗文”云云则表明瞿暹刊刻《集览镌误》当在瞿佑去世（宣德八年，1433）之后。因此，上图署“永乐刊本”乃误，瞿佑《集览镌误》当问世于宣德八年（1433）至天顺七年（1463）之间。瞿著《集览镌误》的重现，对于深入探讨瞿佑的治学与学术视野、狱中心态以及江南私人藏书的兴衰，都极具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集览镌误》与瞿佑治学

《集览镌误》属于“阅史”之作，主要内容是订正王幼学《资治通鉴纲目集览》（下简称《纲目集览》）的讹误。王幼学《纲目集览》则“本为解释《分注》疑事而作”^①，主要解释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字词、句读、训诂以及义理。该书一出，诚如瞿佑所描绘“读《鉴》者争先快睹，视犹指南，共珍惜而尊信之”^②。然而，瞿佑少年未暇细细阅读，下诏狱后，“久居圜圉，长昼默坐，无所用心”，“适都督袁公赉《纲目》一部”，瞿佑方“得以备观”，遂撰成《资治通鉴纲目集览镌误》一书。上图《集览镌误》藏本在体例上，参照建宁新版“于《分注》下附刊《集览》”的作法，将“镌误”附于《分注》、《集览》之后，以便于读者对比阅读。在瞿佑现存著作中，《集览镌误》是惟一的纯学术著作，从中可以窥见瞿佑的治学原则、学术视野以及对传统文史的熟悉程度。

瞿佑对史学有着深厚的兴趣。早年他作《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词云：“千年后，有新安直笔，正统尊周。”^③所谓“新安直笔，正统尊周”正指出了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核心宗旨。后建文辛巳（1401），时在南京国子监任国子助教的瞿佑，曾应都察院都事金华唐岳所请为梁寅《历代叙录》题辞^④；至于《管见摘编》，今已不存，大约近似于“读史札记”之类的片段汇集。可见，瞿佑有着良好的史学素养，故下狱后，他能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撰成《集览镌误》一书。瞿佑在自序中指出，王幼学《纲目集览》的讹误主要表现在：“地理不分南北，官制不辨古今，音训谬于理，而句读不成文，甚者违道背

义而肆为臆说者有之。”^⑤对于《纲目集览》中地理与官制的辨正，足以看出瞿佑的史家风范；而对于王氏音训与句读的指责，则亦可窥知瞿佑扎实的国学功底。

瞿佑对《纲目集览》所做的地理与官制的辨正，完全遵循求实的史学原则。瞿佑列举了《纲目集览》因地名偶同而导致的失误。如卷上“蔡皋狼”条，《集览》以为蔡皋狼为赵邑，《集览镌误》指出“春秋，蔡为楚所灭，其地即今蔡州汝宁府是。与赵境不相接。《地理志》西河郡，乃今太原府汾州是也，安得为蔡地乎？盖地名偶同，遂认为春秋蔡地，非也。”瞿佑将地名的解读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他的解释无疑更具说服力。他如卷下“河华”条：“黄巢军抵关下，不见其际，呼声振河华。”对此，《集览》的解释是“河华，河本西羌地，汉置金城郡。后秦置河州，今隶临洮府；华本汉郑县，后魏置东雍州，西华改华州，今隶京兆府。”而瞿佑则以为：“河华，谓黄河与华山耳。俱在潼关左右，今谓河为临洮之河州，则去潼关远矣。不详地势乃至如此。”瞿佑能结合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理背景，对地名做合乎实际的解释。两者对比，读者很容易判断孰是孰非。王幼学对某些地名的解释，甚至直接抄录工具书，并没有根据上下文的含义作恰当的考辨，这导致了他对诸如“三垂”、“颍川”、“宛戍”、“高塘”等条解释的讹误，而瞿佑对于地名的阐释与选择恰恰照顾了历史语境。

再如官制，王幼学对古代官制很不熟悉，“官制不辨古今”的情况的确存在。如卷上“辟疆守”条：“乃择宗室可用者，拜二人光禄大夫，辟疆守长乐卫尉。”王幼学解释为：“辟疆，刘辟疆，楚元王交之孙，为郡太守；长乐卫尉，刘长乐为卫尉。《百官表》：‘卫尉掌宫门卫屯兵。’”似乎并无什么大碍。但瞿佑则以为：“官制，凡阶卑官高者称守。此时辟疆与长乐二人俱拜光禄大夫，而辟疆仍守长乐卫尉。《集览》徒见长乐之名偶同，遂分‘辟疆守’为句，‘长乐卫尉’为句；殊无文理，又失当时事意，甚可笑也！盖长乐，宫名。霍光婿邓广汉亦为长乐卫尉可证。”很明显，《镌误》的解释更接近历史原貌，也更有道理。又如卷上“上遣行”条，《集览》称“上遣行者，上奏于天子而遣之行也。”瞿佑则辨正说：“官制凡阶高官卑者称行，此谓‘上奏而遣之’则

① 瞿佑《资治通鉴纲目集览镌误》“魏作寿陵”条，上海图书馆藏等级品。

② 瞿佑《资治通鉴纲目集览镌误》自序，上海图书馆藏等级品，下文所引除特别注出外均出自该书。

③ 瞿佑《沁园春 观三国志有感》，见《明词汇刊》本《乐府遗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④ 瞿佑《历代叙录题辞》，日本内阁文库所藏胶卷本。感谢陈庆浩教授复制惠赠。

⑤ 引文均见瞿佑《资治通鉴纲目集览镌误》，上海图书馆藏等级品，不一一注出。

是，而谓‘遣之行’则非也。盖是时索班阶高官卑，故称行长史。如更始遣刘秀行司隶校尉，袁术表孙坚行破虏将军之类。”瞿佑注意将官制的惯用法与历史实际结合起来解释官制。他如“除守太师”条亦是，王幼学解释为：“凡言守者，出于特旨所置，与正员资格同。”瞿佑则辩称：“官制，凡阶高官卑者称行，阶卑官高者称守。审琦以节度使除太师，阶卑官高，故称守，非以出于特旨也。”两者比较，王幼学虽然作了一些有益的考索，但缺乏辨正；瞿佑则善于将官制与历史相结合，因此，他对于《通鉴纲目》的解读要比王幼学更为精深。

除了地名与官制，瞿佑严谨的求实精神贯穿于《集览镌误》始终。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瞿佑始终力求还原历史真相。在“豪杰白头”条中，《分注》原文是“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何以言其无能为也？”《集览》解释为“豪杰、白头，《淮南子》曰：智过百人曰豪，才过万人曰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苏代为齐谓秦王曰：‘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秦齐之交。’”瞿佑《镌误》则辩称“豪杰属上文，而白头举事为句。漉封于高帝十二年，至是四十一年矣。文帝时以老不朝，赐以几杖，故曰白头举事。而此以豪杰白头为句，何说也？”两者比较，王幼学的确查阅了一些工具书，注释也极为详尽，但他不了解“白头举事”的历史含义，也没有深入考究事件真相。瞿佑则熟悉历史，注意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阐释《通鉴纲目》。在“子布元表”、“羊公”、“卓犖”、“陈思求而不允”、“政君”等条目中，瞿佑正是从史实出发，对《纲目》作了恰当的解释，对《纲目集览》作了令人信服的订正。

对于《通鉴纲目》文字的解释，无法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王幼学的失误，恰恰忽视了对史实的考究，直接摘录有关工具书，仅从文字上梳理，甚至掺入了臆想的成分。如“臣下无复外家为据”中“为”字的读音，“误相字于前”中“相”字的读音、“与坐云台之下”中“与”字的读音等，音调不同，对整个字义与句意的理解也就不同。瞿佑则能据其上下文意，结合历史背景作正确的音训。如“散然”条，《分注》云：“罗睺乃与诸将大临（聚哭告哀）三日，放兵散，然后诣俊降，上江皆平。”《集览》解释称：“散然，散，上声，闲散也。白居易诗，闲散读作平声。”瞿佑则辩称“周罗睺闻国亡，乃释放其兵，散归田里。然后自诣秦王俊降。散字只作去声读，属上句。今作上声，又引白诗作平声，而以

散然为句，恐作史者无此文法也。”将《纲目》、《集览》、《镌误》三者比较，很明显，《镌误》的解读接近本意。

王幼学对文字的解释也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对《集览》字词与句义的订正成为《镌误》的主要内容。《镌误》举出了《集览》许多“句读不成文”例证，如“充君说”条，《分注》云：“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说。乃谓连曰：‘歌者之田且止。’”《集览》解释“充君说，说读悦。”《镌误》则称：“充字当属上句，而‘君说’二字自为一句。谓察度功德而所赐与者，无不充足也。今以‘充君说’为句，则上文所与，无不四字，成甚文理？”两相比较，王幼学对于文字的理解与把握也远不如瞿佑。瞿佑不仅考虑到了单个字词的解读，也注意到了整个句意的分析。将《镌误》与《集览》对比，瞿佑的解读明显细致深入。

王幼学《集览》自序称“编始于大德己亥迄于延佑戊午，积二十年，七易稿而编甫成”^①，可知“幼学之作是书用心良苦”。但由于其本人缺乏对于历史事实的考究，对于文字的解释流于肤浅，客观上，王著有贻误后学之嫌。以致在瞿佑《镌误》之后，仍有学者不断追究、考证幼学《集览》之误。在世人“共珍惜而尊信之”语境中，瞿佑《镌误》扩人耳目、拨云见日，对时人解读《纲目》补正之功尤为突出。但同时需指出的是，由于“第以患难中别无书籍可考，而新版又多脱略，乏善本校正为可恨耳”，以致瞿佑《镌误》尚存不足。如“长君”条，瞿佑以为“长君，犹言长者，非指援也”即属于“别无书籍可考”所导致的讹误。后来的文人陈济（1422），由于著述条件相对宽松，稍微翻阅有关资料，便在其《正误》中轻松地指出“杨君引窦长君为比，非指援也”^②。狱中著述难度可想而知！瞿佑仅靠自己的广博的知识与长期积累的古文功底，便指出《集览》讹误216条，为后来陈济《正误》篇幅之半，诚为不易！

二、《集览镌误》与狱中心态

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兴衰得失，《资治通鉴》对于旧时官僚参政、行事极具借鉴意义。宋末元初胡三省评此书曰：“为人臣而不知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

^①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 陈济《集览正误序》，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文渊阁四库全书。

知通鉴，则谋身必致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①曾国藩也称：“若能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必有所持循”（《曾国藩文集·予罗少村书》）。瞿佑由国子助教升为周府长史，因“藩屏有过，先生以辅导失职，坐系锦衣狱”、“久居囹圄，长昼默坐”，在锦衣卫狱中研读《通鉴》并撰成《集览镌误》。因此，如仅仅将该书简单视作“磨光刮垢”的拾遗补缺之作，可能忽视了瞿佑的狱中心态。笔者以为，瞿佑狱中研读《通鉴》，当源于明成祖的圣意。他的著述流露出对自己“辅导失职”行为的检讨，反映了作者的狱中心态。

首先，“适都督袁公贲《纲目》一部”绝非袁字本人所为，乃成祖授意。瞿佑在《集览镌误》自序中称：“不料残龄，久拘囹圄，长昼默坐，无所用心，适都督袁公贲《纲目》一部，乃建宁新版……。”其中的“都督袁公”即左都督袁宇。据《万姓统谱》卷22载：

（袁）宇，寿州人，父洪开国功为左都督。宇事建文时，有军功，为指挥使。宇从李景隆北进有功，升后府都督同知；建文三年六月，靖难将李远出沛泗，掠饷道。宇率步骑三万邀截，中伏，大败。宇脱身走。以其弟容为文皇驸马都尉，故得不死。^②

也许是因为其弟驸马爷袁容的缘故，都督袁宇在朱棣执政以后，并没有受到过多牵连。相反，在明成祖的削藩斗争中，袁宇反被委以重任。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癸卯，朱棣命左都督袁宇往四川、云南整肃兵备，镇抚一方，赐书岷王梗，令其“凡事可与袁（宇）计议而行”，“夫藩屏至重，贤弟宜慎出入，谨言节饮，庶诸夷有所瞻仰，而不负兄之所望”^③。瞿佑因“辅导失职”而下锦衣卫狱，袁氏兄弟当为知晓内情者。袁宇极有可能参与了逮捕周府长史瞿佑的行动。

众所周知，瞿佑下狱与朱氏兄弟的宗族政治斗争密切关联。成祖登基不久，他就意识到藩王与中央政权的冲突，遂着手“削藩”。而朱橚屡为不法之事，且为宗族之长，朱棣必多加提防。瞿佑在《至武定桥》诗后注：“永乐六年四月，进周府表至京，

拘留锦衣卫。”^④也就是说，瞿佑成了明成祖朱棣与周王朱橚之间的政治牺牲品。瞿佑在狱中曾作诗称：“不才弃斥逢明主，多难扶持望故人。”^⑤但其下狱之后，没有一个“故人”出手相救。又有诗句云：“投老渐思依木佛，受恩未许拜金鸡。”^⑥也就是说，瞿佑下狱期间，曾有太子数次“录囚”机遇，但瞿佑均不得名列其中。诗句“拜金鸡”颇耐人玩味。“金鸡”是古代颁布赦诏时所用的仪仗，常以喻大赦之典。瞿佑“受何恩”而使太子亦有所顾忌？笔者以为，由于最高统治者明成祖直接干预周府长史案，在“诏狱”面前，上至太子下及都督袁宇，均不敢对“诏囚”有丝毫的干预行为。他“贲《纲目》一部”绝非是让瞿佑狱中解闷，实受命于明成祖，含有明显的政治用意。诚如宋末元初胡三省称“为人臣而不知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成祖希望瞿佑读《鉴》，反思自己的“辅导失职”之罪，与其永乐三年的赐书周府“严戒长史行事存大体”^⑦的用意是一致的。

其次，《集览镌误》某些条目也流露出瞿佑对自身命运的反思。对于“适都督袁公贲《纲目》一部”的举动，聪明如瞿佑者绝不会没有领悟。他肯定察觉到了成祖让自己反思与忏悔的用意。但他能怎么办？“不才弃斥逢明主，多难扶持望故人”中的“明主”不仅指成祖，还包括周王朱橚。他不能揭发周王的不法活动，那只会加重长史的罪责；他也不能替周王辩护，那很明显有违圣意。他之所以选择写一本《镌误》，也许是对成祖用意的另一种回应。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集览镌误》中瞿佑对人臣之道的反思。如卷上“初作寿陵”条：“然有务崇奢侈，伤财害民，如成帝之作昌陵者。《集览》不于彼论之，此则光武遵尚俭薄，先儒复美其见理明达，而乃屑屑言之，盖徒得凶事不豫之说，而不度其时事之不同，可谓胶柱鼓瑟者矣。”瞿佑有没有谏周王“尚俭薄”已经不得而知，但已经出土的河南周王墓穴则是“尚俭葬”的生动例证。他若“从容”条：“是时吴主方责群臣，谓君臣喜戚相与共之，而乃匿情不言。凡事有是有非，诸君岂得但守禄位，从容自适而已哉。今注作上声，而以

①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32。

② 《万姓统谱》卷22，文渊阁四库全书。

③ 《明太宗实录》卷10下，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0168页。

④ 瞿佑《乐全诗集》，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感谢陈庆浩教授复印惠赠。

⑤ 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和狱中诗”，见《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97。

⑥ 同上。

⑦ 《明太宗实录》卷44“永乐三年秋七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劝奖释之，大失当时事意。”也论及忠臣相处的原则。“一似胡广”条：“汉胡广，历事六朝，固位持禄，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薄之。故王恭以此讥王珣。若如《集览》所言，乃誉之，非讥之也。后魏崔光、唐杜佑，皆在朝岁久而浮沉取容，无所建明，时人皆比之胡广，与此意同。”反思人臣之“忠”与“媚”。他若“昭陵”条、“累大”条均涉及到人臣、人主之道。可见，瞿佑对最高统治者的用意并非没有体察。

值得注意的是，瞿佑《集览镌误》多次强调“移文”一事，这实际上是对瞿佑在周王府“移榜郡县”一事的回应。

据《国榷》载永乐三年秋七月：“周府长史移榜郡县，上喻周王止之。”明成祖朱棣在七月癸卯，赐书周王橚曰：“夫朝廷事与王府事体不同，长使司专理王府事，岂得遍行号令于封外？……仍严戒长史行事存大体，毋使人讥议。”①对周府长史“移榜郡县”予以严厉斥责。而瞿佑此时恰担任周府长史一职。晚年瞿佑重回南京，作《舟中望紫金山》②一诗，回顾了在周府任职一事，称“白首归来只依旧，山灵不必更移文”，感叹自己已获自由，不必再为“山灵”移文。“移文”当指行于不相统属的官署间的公文，亦泛指旧时平行文书。至于“移榜郡县”，周府以为是平行文，没有什么过错；成祖则以为是下行文，属于“行号令于封外”的行为，长史移文境外，至少“行事失大体”。

瞿佑狱中所作的《集览镌误》，也多处谈到“移文”，如卷上“文移”条：

汉玄帝更始元年，玄北都洛。

分注 更始将都洛阳，以刘秀行司隶校尉，使前修宫。秀乃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

集览 文移，笺表之类也。官曹公府不相临敬则为移。

按，文移，谓官府行移文书，若今符檄之类，非笺表也。又如“移书”条：

汉灵帝中平六年，以袁绍为渤海太守。

分注 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三公，移书州郡，陈卓罪恶，征兵赴难。

集览 移书，官曹公府不相临敬则为移，笺表之类也。

按，移书，即移文也。三公移书州郡，是以上临下，岂笺表之类哉？

上述两则例文中，王幼学均将“文移”或“移书”的核心意义界定为“官曹公府不相临敬则为移”，也就是说，“文移”或“移书”属于公文中的平行文范畴。这种解释源于辞书或工具书，对于理解句意并无大碍。但瞿佑却坚持以为，“文移”“移书”是“官府行移文书，若今符檄之类”，属于“以上临下”的下行文范畴。将瞿佑的观点与其永乐三年替周王“移榜郡县”而受到斥责一事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两者的因果关系。瞿佑当年也是将之视为平行文而“移榜郡县”，结果引起永乐皇帝的震怒。瞿佑《集览镌误》中对“移文”的重新理解与释义等同于承认自己当年犯的错误，这反映了他对自身“辅导失职”的反思。

另外，瞿佑周府长史的身份也为他阅读《纲目集览》提供独特的视角。如卷上“国臣”条，王幼学以为“国臣”乃“姓名也”，而瞿佑身为周府长史，明白自身职责，故他解释“卫瓘为太保封公，得置官属。故其女与其国中之臣书，而主簿刘繇乃为之讼冤。今以国臣为姓名，不知何据？又按，东魏太师泰杀其国臣王茂，《分注》谓安定国臣，是时，宇文泰封安定公，则知国臣为本国之臣，于此可证也。”如此解释，合情合理，自高幼学一等。

瞿佑下狱显然是介入了成祖与周王之间的复杂矛盾，而都督袁宇所“赍《纲目》一部”实乃是成祖授意而为，目的在于让瞿佑反思人臣之道。瞿佑《镌误》流露出对人臣之道的理解，反映了对自己“辅导失职”的反思。

三、《集览镌误》与江南私家藏书的传承

前文已经提到，上图藏《集览镌误》所留印章颇多。除赵琦美“绮宜之印、清白传家”外，该书卷首有“黄裳青囊文苑、木雁斋、季振宜印、沧苇”等朱印，目录页留有“黄裳浏览所及、上海图书馆藏、黄氏珍藏善本、季振宜藏书、容家书库”等印，卷上有“草草亭藏、黄裳藏书、季振宜藏书”，卷终留有“容家藏书、黄裳、草草亭藏书记、读异斋藏、吴郡张绍仁学安藏书”诸印。由此可知，该书经历了赵琦美、季振宜、张绍仁、黄裳诸君承传收藏。可谓见证了江南私家藏书的兴衰演变。

据赵琦美万历三十五年五月初十日志“张浙门氏原本，录于白门官舍”，该书最早应由张浙门氏收藏，张浙门氏生平不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元故宫遗录》云：“明萧洵撰。洵，庐陵人。……洵后为湖州长兴令，欲刊未果，其本归于吕山高氏

①《明太宗实录》卷44“永乐三年秋七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0691页。

②瞿佑《乐全诗集》，日本内阁文库藏本，陈庆浩教授复印惠赠。

家。洪武丙子，松陵吴节从高氏钞传。万历中，武进赵琦美得之，以张浙门家钞本互校，因行于世。”又，该书赵琦美跋称：“予于万历三十六年间，得于吴门书摊上，字画故暗不可句，因为校录一过。三十八年庚戌，于金陵得张浙门墨本，为校正数十字……”可知，张浙门是一位与赵琦美同时的金陵藏书家。而所谓“白门官舍”，当为南京专门用以接待来往官员的宾馆。赵琦美于万历、天启年间，历任太常寺典簿、都察院都事、刑部郎中等职。梅鼎祚、焦竑、冯梦楨、赵琦美曾订约，每隔三年聚会于金陵，各出所藏精本交流。赵氏歿，子孙不肖，藏书悉归谦益。绛云火后，谦益将赵氏藏书转赠钱曾。“钱遵王藏书，多半归于泰兴季沧苇，故季沧苇藏书目所载，多半述古旧物。”^①《资治通鉴纲目集览镌误》卷首“季振宜印、沧苇”以及目录、卷上首页“季振宜藏书”二印，即可见证季沧苇(1630—?)收藏过此书。此后，该书辗转传入张绍仁手中。张绍仁，嘉庆、道光时的藏书家、校书家。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42子部“《齐民要术》十卷，张绍仁校宋本。张氏手跋曰：近见……数年前，我友黄尧翁购得一校本，……道光新元三月十九日书于仁寿里之读异斋。切庵张名绍仁”；又，卷44子部“《道德真经指归》七卷，张切庵校本，……道光三年(1823)九月十九日书于仁寿里读异斋。切庵张名绍仁”；可以知“读异斋”乃张氏仁寿里的书斋名。据清江标《黄尧圃先生年谱》卷下“中秋后一日为张切庵跋钞校本《雁门集》”按：“张切庵名绍仁，长州人，所居在乔司空巷，见《士礼居跋》四卷。屡与先生往还，皆见跋语中。曾云：校书心到眼到手到，在朋友中无出其右。”可知其与黄尧翁

(1763-1825)交往深厚，往来密切，校书水平也最为黄丕烈所赏识。而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22集部四《翰林杨仲宏诗八卷》卷首尾有“吴郡张绍仁学安藏书、切庵珍藏诸朱记”，知“学安、切庵(切庵)”均为其字、号。因此，上图藏等级品《资治通鉴纲目集览镌误》“读异斋藏、吴郡张绍仁学安藏书”印，均为张绍仁藏书之印证。

上图藏《集览镌误》留有铃印最多的就是当代文人黄裳了。黄原名容鼎昌，满族；笔名黄裳、勉仲、赵令仪，室名有来燕榭、草草亭、梦雨斋等。黄裳在该书卷尾，清常道人题跋前也写有一段识语“庚寅冬至后一日，得此清常道人手跋本于菰里瞿氏，人间奇秘，得入库藏，喜何可言！漫记，黄裳。”其中“菰里瞿氏”指“铁琴铜剑楼”当时主人瞿凤起(1908~1987)。由此可见，该书由张绍仁辗转流入铁琴铜剑楼，而黄裳最终于“庚寅冬至后一日”即1950年12月23日于五世楼主处获得，黄氏“喜何可言”！誉为“人间奇秘”！狂喜之余，在该书留下“黄裳青囊文苑、木雁斋、黄裳浏览所及、黄氏珍藏善本、容家书库、草草亭藏、黄裳藏书、容家藏书、黄裳、草草亭藏书记”等十枚铃印，足可见黄氏对该书的珍视。黄氏之后，该书复归上海图书馆，被当作等级品加以珍藏。

因此，上海图书馆藏瞿佑《集览镌误》不仅对于探究瞿佑治学与狱中心态有重要意义，由于该书经历了张浙门—赵琦美—季振宜—张绍仁—菰里瞿氏—黄裳的收藏历程，某种意义上，该书又是见证江南私家藏书兴衰演变的活化石。它的传承递藏，正是江南私家藏书兴衰递承的缩影。

(感谢前辈黄裳先生提供的帮助)

The Verification and Comment on *Zi Zhi Tong Jian Gang Mu Ji Lan Juan Wu Of Qu You*

QIAO Guang-hui

(Chinese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The dissertation here firstly disclose the content and value of *Qu You's Zi Zhi Tong Jian Gang Mu Ji Lan Juan Wu* which is rarely known to public. The reappearance of this book does not only explore Qu You's academic thought and vision, but also explore the mood of Qu You's in prison. The collection of this book also witnesse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 in South China.

Key words: Qu You; Ji Lan Juan Wu; mood in prison;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 in South China

(责任编辑:陈剑)

① 郑振铎《西谛书话》卷下，三联书店1983。